

方言与中国文化*

游汝杰 周振鹤

语言是我们的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共生的。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

语言本来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不过在文化现象中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可以把它独立出来,讨论它跟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工具,同时也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有了语言,人类才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对文化的研究能够扩大语言学的视野;对语言的探索则能加深对文化史的研究。因此,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西方的学术界如布亚士、克虏伯和萨丕尔等人,都把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

在我国,类似的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也还很少。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大致相当于“小学”,包括音韵、训诂、文字三大部门。“小学”乃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推求古音,训诂学考证词源、文字学解释字形,研究的范围限于书面语言,目的只是为了解经。进入二十世纪,西方语言科学东渐,我国语言学始摆脱乾嘉学派的藩篱,扩大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也有了新的突破。但是几十年来语言学家的目光还只是集中在描写语言现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构拟古音为主要目的的历史语言学和以研究语言规划为目的的应用语言学上。除了罗常培先生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过初步研究,于1950年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外,很少有人作过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中国境内的语言,据一般的估计有六、七十种之多,几乎每一种语言的内部都有方言的差异。如果将如此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文化语言学?它跟德国的人种语言学、美国的人类语言学及拉波夫近年来所倡导的社会语言学有所区别,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边缘学科,应该把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索语言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自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出版半个多世纪来,我国所刊行的方言调查报告已足以让我们开始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

方言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理变体,社会方言则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等不同,口音、措词、言谈也有区别。例如在清末明初的常州方言中有街谈和绅谈的区别,两者的连读变调型式有所不同。街谈是城里大多数人说话的型式,绅谈或多或少局限于文人或官吏家庭。本文暂不涉及社会方言方面的问题,先就地域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择要略加论述。

一、方言与移民史

按历史语言学的假说,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语言分化是从移民开始的。同住一地的人们,本来同说一种语言,后来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到别地,久而久之使两地形成两种不同的方言。如果向更多的地区迁移,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方言。方言分化固然大多是由移民开端的,但是后来的继续分化和演变过程却又跟行政地理、交通地理、自然地理等因素有关。

历代移民是中国方言地理分布的主要成因。汉语的六大南方方言,吴、闽、粤、湘、赣、客,都是由历代北方汉人向南方迁移发其端的。分化的先后次序大致是这样的:先秦时代中原一带的华夏语言开始渗

* 本文是笔者的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部分内容提要。

透到今湘语区和吴语区,随着北方移民的陆续增加和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到六朝前后形成吴、湘语;粤语的分化是从秦始皇在岭南“谪戍五十万”开始的,闽语的产生应始于三国东吴汉人成批经浦城入闽之时;而西晋永嘉丧乱后多次的北方居民大南移则造成赣、客方言。客家方言象一个巨大的楔子,插入南方的腹部,把湘语和吴语永远地分隔开来;又把闽语限制在东南沿海,从而奠定了中国南方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北方方言的次方言西南官话就整体来说是迟至元明时代才形成的。现代湘语分成所谓新湘语和老湘语两种,新湘语是在长期以来受西南官话的严重影响下形成的。新湘语跟老湘语不能通话,跟西南官话通话却没有多大的困难。

在北方方言南下之前,南方还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天下。汉语在同化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当地语言的成分。一直到今天我们至少还可以在吴、闽、粤语中找到古越语的底层遗存。

细究起来,还可以发现汉语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类型和种种特点,无不跟古代移民的方式有着深切的关系。这些关系大致如下:

第一, 占据式移民和方言内部的大面积一致性。

北方方言分布地域之辽阔、使用人口之众多、内部结构之统一,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从哈尔滨到昆明,从南京到酒泉,甚至远至乌鲁木齐和拉萨,各地汉族居民通话并没有什么大困难。造成北方方言内部大面积一致性的重要原因得从移民史实中去考察。试以东北方言为例。

东北方言和普通话很接近,方言内部比较一致。但辽东方言和辽西方言仍有一些不同。辽东方言的一些特点跟隔海相望的胶东相同,辽西方言的一些特点跟毗邻的河北北部相同。胶东和辽东的共同特点是:无ng声母,无zh、ch、sh声母(大连和复县除外);无r声母;d、t、z、c、s五母和uei、uan、un相拼时,不带介音,即不读合口;阴平调是降升调型;北京和辽西的共同特点是:有r声母;有zh、ch、sh声母;d、t、z、c、s五母有时可以跟合口的相拼;阴平调是高平调型。

怎么会形成辽东、辽西方言的差别,辽东方言怎么会与胶东的特点相同,辽西方言怎么会与河北的特点相同的呢?这跟移民的历史背景分不开。从本世纪初年开始大批汉人移入东北。他们以河北和山东人占绝大多数。河北北部与辽西邻接,河北人从陆路出关后先进入辽西,再扩展到北部和其他地区。辽西是他们自古以来向东北腹地移民的大本营。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他们渡海登陆后先到辽东半岛和辽河一带,再扩散到本省东部。在本世纪的前五十年,山东人和河北人占据了整个东北地区,所以今天的东北方言和河北方言总的看来有着大面积的一致性。

第二, 墨渍式移民和蛙跳型方言

外来的移民有时并不占领成片的广大地区,而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地点定居下来,然后慢慢地对周围地区有所浸润,好象一张大白纸上滴上若干墨汁,渐渐渗开来一样。但是它们并没有联成一片,中间仍然被别的方言或语言分隔开,好象青蛙跳着前进,不是处处落地一样。这种现象在广西、贵州、云南是很普遍的。这三省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粤人进入桂西应较早。大批汉人进入云贵和桂北还是明代的事。明王朝在平定云贵之后,为了巩固统治,保卫边疆,除了在一些城市留驻守军之外,还在各地大量建立卫所,设置兵屯(今日云贵许多地名还含有“官、堡、营、屯”字样)。这些官兵皆有家室,军籍也可世代相传。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使用和传布他们带来的北方官话。

蛙跳型的方言最初是由墨渍式移民所造成的,它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移民的文化较高,并有保持原有文化的愿望。据说贵州的旗堡人在服饰和习俗方面至今还保留明代的遗风。如果各地移民之间交通往来较多,而跟包围他们的土著交际反而较少,那么互相分散的各地移民语言还可以保持一致性,云贵的西南官话就是这样。

第三, 蔓延式移民和渐变型方言

如果移民只是从某一开发较早、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向四周较荒僻的地区蔓延渗透,那么他们只是把中心地区的方言缓慢地扩散开去,离中心越远的地方方言也就越歧异。这是因为:一,移民越走越远,跟中心地区的来往就越来越少,方言也越来越隔阂,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很自然的;二,移民带来的方言难免要和土著方言接触,并且吸收它的一些成分,这也增加方言的变异;三,方言区的两头又

受邻区方言的影响,歧界也因此增加。

今天的吴语区在历史上是从北向南逐步推进的。春秋战国时代汉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只是今吴语区北部,东汉末三国以后逐步向南部扩展,唐以后扩展到浙西南及边境地区。移民向南部蔓延,吴语也就跟着向南部扩散。南进的吴语移民越走越远,方言也就越来越歧异,再加上与土著语言的融合,到了后来,进到浙南的移民后代的方言跟出发地的方言完全不能通话了。吴语在地理上的南北渐变例子很多。如全浊声母越往南就越重浊,钱塘江以北实际上是清流浊音,到宁波浊度就增加了,到了浙南则变成完全的浊音。

第四、杂居式移民和掺杂型方言

移民到新地后与土著杂居,方言中往往会掺杂进土著语言的成分。这种现象在杂居式移民中是屡见不鲜的。不过掺杂的程度不等,最常见的是吸收一些借词,也有改变语音或语法结构的。这里所说的“掺杂”主要是指后者。掺杂程度严重的典型例子是五屯话。五屯人聚居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县,周围多系藏族村落,人口总数二千左右。五屯人至迟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从四川迁入的。五屯话本来应该是一种汉语方言。但是由于四、五百年来受到藏语的严重掺杂,人们甚至可以怀疑它能不能再算汉语方言了。譬如在词汇上,既有汉语词,又有藏语词,有时候表达同一个概念,汉语词和藏语词可以并用;还有些词是汉藏合璧词,即由汉语和藏语的成分互相结合而成。例如“门帘”[mən'təjər'we]其中第一个音节是汉语“门”;“犯人”[lɔ'ke-wa],其中[lɔ'ke]是汉语词根即“劳改”,[wa]是藏语表示“人”的词缀,不费一番辨认的功夫,就很难找出其中的汉语成分。

第五、闭锁式移民和孤岛型方言

移民到达新地后聚居在一个较小的地域内,自成社团,跟外界的接触交流不多,当地人也不介入移民的社团。那么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长期保留原有的基本面貌,而与包围它的土著方言有明显的区别。这种移民方言所流行的小块地域在包围它的大片土著方言区中好象大海中的孤岛。方言岛上的移民从来源看可分成两大类型,一是军队的驻防或屯垦;二是平民逃荒、逃难或移垦迁徙而来。

南方的好些官话方言岛都是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如福建的南平话、洋屿话;浙江的金乡话;海南岛的军话等。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著名的四川华阳凉水井客家话;浙江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江苏宜兴的闽语等。

例如处于闽东方言区(以福州为中心)包围之中的洋屿话,当地人把它叫作“京都话”。这种话不仅在语音上跟北方话接近,在词汇上基本使用北方的词汇,甚至还保留北方话中较土的口头词汇。如“今儿个、明儿个、娃娃、耗子、唠话(谈天儿)、多咱、蚂螂(蜻蜓)”等。洋屿话的形成从康熙年间开始,当时清廷为了镇守边防,派山海关的汉军旗人移驻福建,雍正七年改编为水师,驻扎洋屿。洋屿是一个城堡,守军又是清军嫡系的旗营,他们养尊处优,跟土著的交往不多,所以口音和词汇也易于保存。

现代方言岛的方言跟出发地的方言只是接近而已,并不完全相同。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新地和旧地方言长期隔绝,各有所发展,到了今天面目当然不同;二是我们说方言岛的方言是闭锁型的移民造成的,也是相对而言。移民不可能不跟土著接触,因此也难免要吸收当地的方言成分。例如南平话就从建瓯话吸收了一些词汇:

普通话	河边	土	厕所	母狗	蚯蚓
南平话	溪边	泥	茅司	狗母	曲婊
建瓯话	溪边	泥	东司	狗嫫	黄婊

第六、板块转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

移民从祖辈的大本营大规模地转移到与旧地并不邻接的地区,去开辟一个新天地。他们带来的方言至今与旧地方言相类似,仍属同一个系统。这种板块转移式的移民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比较晚近的。

最好的例子是今天的闽南话。它除了使用于闽南以及与之邻接的粤东潮汕地区外,还使用于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浙南、台湾和海外的东南亚等地。各板块的方言,除海南外,语音系统的距离较近。以台湾闽南语为例,闽人大规模入台是南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的事。起初以泉州人为多,后来闽南话大本营的其他地区人也陆续渡海移殖。至今他们所说的话仍然和大陆上的厦门话差不多。从大陆入台的移民以闽南人为多,其次是从粤东入海的客家人,今天的台湾,除桃园、新竹和苗栗外,其他地区以闽南

话占优势。客家人入台是板块转移式的,至今他们的方言与梅县一带客家话还十分相似。客家话只是在新竹和苗栗两县占优势,在桃园则与闽南话平分秋色。

浙南一些海岛上还有闽南话的另星板块,最大的一块是洞头岛,岛民共十一万,说闽南话的约占三分之二,其次是玉环岛。浙江沿海的闽南话往北不超过温岭的石塘。这些小板块的转移跟渔业活动分不开,据说浙江沿海洋面的捕鱼作业区,舟山来的渔民不超过石塘以南,闽南来的渔民不超过石塘以北。久而久之闽南的移民及其眷属就在这些海岛上落脚,并且世代蕃衍。

方言学和移民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止上述这些内容。现代方言的某些个别特征(包括地名用字)还可以跟移民史实相印证;方言学研究对于鉴别居民族别和原籍也大有用处;方言的历史层次可以反映移民的历史层次等等。

二、方言与地方文化

方言可以说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一个地方的戏剧、曲艺、歌谣、谜语等文艺形式都是以方言作为工具才得以表达的。当然地方文化还包括人情、风俗、习惯、服饰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特征有时候也会反映在方言里。方言研究实在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一把钥匙。

戏曲史上有些问题光是搬弄文献记载,并不能解决,从方言入手,则往往可以迎刃而解。成化本《白兔记》编者的籍贯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白兔记》是元明以来所谓“四大传奇”之一。1967年在嘉定出土的明代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是现存最早的传奇刻本,它不讲辞藻,章法未经梳理,错别字很多,刊刻也颇粗疏,显然是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的底本。这一刻本包含不少方言成分,在前场对白中有一段话说:“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此灯窗之下,磨得墨浓,斩(蘸)得笔饱,编此一本上等孝义故事。”光看这一段文字,对这本传奇的编者是“永嘉(今温州)书会”才人这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近年来的有关研究文章也没有就此提出异议。但是仔细分析它的方言成分,我们发现编者不可能是浙南的永嘉艺人,而应该是苏州一带的艺人。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作品中的方言词汇几乎全部是北部吴语。例如把“爸爸、妈妈、妹妹”称作“爷、娘、妹子”;二是通过比较别字和正字的音韵,可以看出编者的语音系统是属于北部吴语的。例如把“长、祝、藉”误写作“常、嘱、极”。编者明明不是永嘉人,为什么却自称“永嘉书会才人”呢?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南方戏文发源于永嘉,永嘉书会当时已久负盛名,因而伪托依附,以抬高身价;二是可能有外地艺人参加当时的永嘉书会。

地方戏与方言关系极为密切。广东的琼剧本来是潮汕地区的高腔剧种的一个支派,流传至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后,改用海南方言演唱,被称为“土戏”,后来又与流入岛内的粤剧融合,遂成为琼剧。北方的梆子腔在晋陕交界地带形成的时候称为山陕梆子,后来流入关中衍变为秦腔,进入晋东南成为上党梆子,此外还有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等,无不都是与当地方言、民歌和原有的小戏结合而成的新产品。汉语方言种类的繁杂是地方戏曲丰富和多样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方戏曲是用方言演唱的,虽然它也吸收书面语成分和某些别地的方言成分,但是它毕竟是以某一地的方言为基础的,一般说来,它的听众也只限于该方言地区(京剧、越剧等大剧种例外)。所以戏曲地理常能为方言的区划和方言间的可懂度提供佐证和参考。

广东的四大剧种跟广东省境内的方言区划基本重合。粤剧自清末以后才用粤语演唱,流行于广东和广西的粤语区,包括香港。二三十年代还曾在南洋的新加坡、吉隆坡、西贡等地流行过,因为那些地方有粤语观众;潮剧用属于闽语的潮州方言演唱,流行于潮州方言区;琼剧用属于闽语的海南方言演唱,流行于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海南方言区;广东的汉剧则是客家方言区的主要剧种。历史上地方戏剧的地理分布也可以为历史上的方言地理提供线索。例如清道光年间温州乱弹戏馆的分布地点超出了今温州方言区,北界达到乐清的清江渡以北地区。这说明温州方言区在一百年前应比现在大一些。

各地的民歌是用纯粹的当地方言传唱的。但是自《诗经》以来,中国的文坛几为文人学士所独擅。文学语言也一概用雅言。虽然也有些歌谣散见于历代的文献中,在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中也可以找

到一些方言口语词汇。但是终究不能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占相当的地位。清末以前用纯粹的方言编纂成集的民歌很少。最著名的首推明末冯梦龙所辑《山歌》。这一部吴歌选集共分十卷,前九卷是用比较纯粹的苏州一带的方言记录的,最后一卷《桐城时兴歌》是用兰青官话记录的。由于前九卷的方言系统比较纯粹,又有冯梦龙的注释,颇能反映当时苏州一带方言的面貌。《山歌》是押韵的,通过系联、排比、分析韵脚用字,可以归纳当时苏州方言的韵类,进而构拟音值。它记录的方言词汇有三百五十个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现代苏州不用的历史词汇,如“渠”(他)、团鱼(甲鱼)等,部分地体现了苏州历史词汇面貌。前九卷共收二百三十七首吴歌,包括一千个以上句子。分析这些句子可以了解当时苏州方言的语法结构。《山歌》对于构拟古吴语具有极高的价值。

因为民间歌谣的记录和研究跟方言学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中国现代方言学研究是五四运动以后,由歌谣的采集和研究揭开序幕的。当时沈兼士在《今日中国方言新趋势》一文中说:“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歌谣里所用词语,多少是带地域性的,倘使研究歌谣而不研究方言,歌谣中的意思、情趣、音调,至少有一部分损失,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其实缺少方言学知识不仅有碍于歌谣内容的了解,而且在采集和记录方面也会遇到困难。

方言对于某些带有地方性的栽培植物的历史研究也能提供宝贵的信息,这是饶有趣味的。

例如荸荠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低洼地区。广东方言称荸荠为“马蹄”,我国出口的荸荠商品名称也作“马蹄”。“荸荠”跟“马的蹄子”又有何缘?若仅从汉字字面去解释,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荸荠原产印度,后来传入中国。广州话“马蹄”读作。[ma⁴:hei²]今台语(古越族语言的后裔)中水果这一类词的大名是[mak],即以[mak]前置各类水果名称。如武鸣壮语:桃子[mak²:au²]、野莓果[mak²:um⁶]、葡萄[mak²:kit⁷]、杨梅果[mak²:se⁵]。又龙州壮语:荸荠[mak²:heu²]。原来广州的[ma⁴:hei²]中的前一个音节源于古台语的[mak],是“果子”的意思。而[hei²]这个音节又是古台语词“地”的语音遗存。“地”在几种今台语中的读音是这样的:武鸣壮语[rei⁶]、西双版纳傣语[rei⁶]、三都水语[dai²]、莫语[dai²]。这些语音跟广州的[hei²]相对当。因此“马蹄”是“地下的果子”的意思。这个词不仅两个词素的读音来源于壮语,而且前后的置也跟壮语一样,即修饰语成分后置。“荸荠”在另一些闽、粤、客方言中被称作“马荠”(厦门)、马荠(梅县)、麻荠(永安)、马蹄薯(海南),这些词的第一个音节和广州的同一系统、同一来源。前三个词中的第二个音节“荠”和第四个词中的“薯”则是汉语成分。这四个词都是汉台语合璧词。在同一个词上反映出不同语言成分的层次重迭,先有台语词,后迭以汉语成分。

三、方言地理和人文地理

方言地理的种种问题,跟人文地理的关系也很大,特别是其中的行政地理、交通地理和经济地理。

我国有两千多年系统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严密的地方行政区划,其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都是世所罕见的。这是我国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在研究中国方言地理的时候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秦代以来行政区划的沿革对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使得一府(州、郡)之内的语言、风俗趋向一体化。特别是唐宋以后府(州)所辖地域不大不小,对于一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府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府治不但是一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该府的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府属各县与府治的密切接触必然有助于消除各县方言的特殊之处,使各县的方言自觉不自觉地向府治靠拢。所以在历史政区界线相对稳定的地区,旧府辖境内的方言往往具有强烈的一致性。

中国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承平时一般百姓都厮守田庐,耕读传家,安土重迁的观念十分深厚,除非有战祸、天灾,一般都视离井背乡为畏途。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少有超过本府之外的。所以社会安定时期人口远距离流动并不多见。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方言地理时不可不注意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

现代的方言地理,若从旧府的辖区来看,其内部有很强的一致性。这样的例子各省都有。如上海的旧松江府、江苏的旧徐州府、浙江的旧温州府等。再如婺源今属江西省,但是方言跟其江西邻县并不属同一系统,而跟皖南的徽州同属一系统。因为婺源在北宋以后,数百年间一直隶属于今晚南的歙州(南宋以后到清代称徽州)。长期的隶属关系促使婺源的方言与徽州相一致。

西方的方言地理学是以同言线为划分方言区的唯一基础的。“同言线”这个术语是仿照“等温线”制定的。由同一条同言线圈定的地域具有某一个相同的方言特征。几条同言线重合或密集在一起就成为一条“同言线束”。传统上就是以同言线或同言线束作为划分方言区的界线。问题是有些地区的同言线十分离散，不但不能密集成束，而且相距很远。有些西方学者因此走向取消主义，认为划分方言边界是徒劳的。

我们认为，鉴于上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背景，在那些政区相对长期稳定的地区，完全可以放弃同言线法，而采用我们所谓的“历史地理分析法”。这个方法是以前府作为划分方言区的基本单位，选择较多的项目，比较各府之间的接近程度，再根据接近程度将各府经过调整和拼合之后，组成一个个次方言区。我们曾成功地用上述方法给浙江省的方言进行分区。

上述对于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的认识，还有助于构拟古代方言的区划。例如宋代的方言区划，文献上并没有直接记载，那时各地的方言既无法调查，也无法系统地构拟。但是我们可以拿现代汉语方言的区划跟宋代的行政区划作比较，找出那些重合的部分，然后将这些重合的部分拟测为当时方言区的部分边界。再利用唐宋时代移民材料和宋人著作有关方言的零星记载，大致拟测宋代汉语方言区划图。我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是：现代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分区的界线，有好些部分可以（也只能）追溯到宋代的行政区划为止。

移民和政区这两个因素对方言地理的影响有时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政府往往因移民而设政区，或按政区而安置移民。今湖南的沅澧流域是属西南官话区的（按笔者的划分法），这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据《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湖，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北方汉人大批移入今湖南的这一地区。到宋代，荆湖北路的设置又把整个沅澧流域和湖北南部纳入以江陵为中心的同一政区内，极大地有利于推动沅江中上游的开发。于是北方方言也就随着移民和政区的设置，从沅澧下游逐渐向中上游推进，而遍及整个流域。

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对方言地理也起重要的作用。有时候行政地理与这三者有令人惊奇的重合现象，最典型的例子见于福建省。福建多独流入海的河流。古代福建是以这些河流及两岸的河谷平地作为交通孔道的，同时一条条河流的流域也往往成为一个个经济区。每一个流域又大致相当于一、二个二级政区。这些政区又大致与现代福建汉语方言的次方言区相重合。它们的大致关系可以列表说明如下：

今 方 言 区		二 级 历 史 政 区	流 域
闽	闽 东 区	福 州	交溪、闽江中下游
	莆 仙 区	兴 化	木兰溪
	闽 南 区	泉州、漳州	晋江、九龙江
语	闽 北 区	建 宁	建 溪
	闽 中 区	南剑州西半	沙 溪
客	闽 北 区	邵武军（略大）	富 屯 溪
话	闽 西 区	汀 州	长 汀 溪

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除了上述三大部分外，还可以包括：方言和古代民族地理；方言地名和古代文化类型；方言借词和古代文化交流；“域外”方言和中国文化的传播等等方面的关系，限于篇幅不能详论。

“五四”以后中国语言学受美国描写语言学影响很深，在描写语言学的某些方面取得了超过西方的成就，但是在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方面，却大大落后。现在正是放眼世界，从描写语言学“囿园”中走出来，开辟新天地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能在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研究方面给中国语言学增添新的血液和生命。

（本文作者游汝杰，1941年生，中文系讲师；周振鹤，1941年生，历史地理学博士）